

評胡適反黨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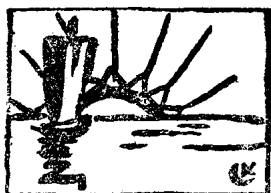
近著

潘辰題



評胡適反黨義近著

陳銘漢
胡適反黨
廣州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1929

光明書局最近出版新書

婦女與社會 譚弟著 定價四角
汪精衛詩存 雪澄編 定價三角
個人主義的哲學 毛一波 定價二角
非革命文學 梅子編 三角五分
嘆咤（長篇創作） 郭蠡著 四角五分
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 陶其情 二角五分
三年來國民革命軍 蔣中正 四角五分

中國革命史

貝華編著
定價五角

中等學校適用教材（第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付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全一冊）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著作者

張振之
潘公展

陶其情
灼華等

編輯者
兼行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光明書局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店

陶序

光明書局把關於胡適先生「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等近著底批評文字，彙集付梓；同時也把我的「關胡博士的知難行亦不易論」，濫竽充數。更來信叫我爲之命名和作序。我覺得胡先生那三篇近著的思想_和理論，都是違反黨義的；所以遭着很多人們的批評，遂名此書爲「評胡適反黨義近著」。我又覺得胡氏知行見解的錯誤，雖宜特別注意，爲文闢之；但胡氏談人權，談憲法的謬見，未可不一辭，何妨忝此機會，稍說幾句，藉以代序。

胡氏感到現狀的不滿，做出鳴不平的文章，而詆毀黨義；這確是笨伯的遷怒。現狀不滿和主義優劣，本是兩回事體，何能混而爲一？更何能因噎廢食呢？胡氏反黨義的動機，不能建築在革命理論上，專專建築在畸形現狀上；實屬可笑之至！

我覺得胡氏反黨義的近著，分析起來，歸納二部：一部是胡氏反對革命的哲學理論

，拾着傳說知易行難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牙慧，而作「知難行亦不易」。又一部是胡氏反對革命的政法理論，信着歐美民主主義的謬說，而作「人權與約法」和「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本書編者，本斯旨而分本書爲「知行問題」和「政法問題」上下二卷。胡氏知行的錯誤，我已於「關胡博士的知難行亦不易論」中，詳細說過。胡氏政法的錯誤，正爲本文之所闡論。我覺得胡氏這種泥於歐風美雨的政法理論，根本上有二個謬見一是把人權當作民權；二是把訓政當作憲政。現在把這二種謬見，略一申述：

(一) 人權與民權 法儒盧梭 (Rousseau 1712—1776) 著民約論倡天賦人權之說；世界政治和法律的思想，日爲丕變。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以及歐美一切政治上的革命，大都受着這種天賦人權學說的洗禮而爆發出來的；所以他們的宣言，多有『人類生而平等』，『人類原來皆自由而獨立』……的一類話。這樣一來，歐美政治潮流的趨勢，便以人權做中心，由人權而民權。這種人權的民權，正是民主主義的眞義所在。乃虛偽的，不普遍的民權，建築在各個人自利自私的人權上。資產

級暨特殊階級，爲着自家人權的發展，勢必行其侵略主義或操縱主義，法律爲其護符，政治爲其轉移，便造成種種人爲的不平等，還談什麼真正的民權呢？大多數民衆既已得不到民權，處在不平等的地位，更談什麼人權呢？本黨民權主義以爲有人權，不一定有民權；有民權，則人權便在其中；遂主張民權的民權和民權的人權；與民主主義所主張人權的民權和人權的人權；頗不相同。前者的民權，以大多數民衆做中心；後者的民權，爲少數特殊階級和資產階級所操縱。前者的人權，以不侵犯他人的人權爲界限；後者的人權，以自私自利做基礎而漠視他人的人權。胡氏倘深知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區別；便覺得「人權與約法」爲妄作了。

(二) 訓政與憲政 本黨建國，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訓政時期是由軍政入憲政的渡橋，也可叫做過渡時期。爲什麼要有這過渡時期呢？總理道：『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爲專制入共

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于亂也。」總理覺得人民對於共和知識，異常幼稚，需乎入塾，因有訓政之說。在這訓政時期，革命政府使人民受着四種直接民權使用的訓練，更養成人民自治能力；異日能遵行憲法而不背。憲法草案的制定，依我看來，最早當在六年訓政的最後一二年；憲法的決定，當在憲政開始時召集國民大會討論和通過。憲法一經頒布，國民政府便將國家一切政治權交給民選之政府主持之，『即爲憲政告成之時』。假若在軍政末或訓政始，便制定憲法，則其憲法最易變做特殊階級和資產階級升官發財的工具；因爲多數人民沒有共和政治的知識。況且『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衆之擁護』；未經訓政的民衆，對於民權既不知運用，從何擁護憲法。憲法任何盡美盡善，終必成爲一紙空文；所以 總理根本上要反對立憲派的主張了。今胡氏依着立憲派的論調，更泥于民主主義的見解，抹殺了客觀的事實，要求國民政府早頒憲法，甯非皮相之見？尤爲昧于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進化真理。這種洋八股的精神，未免過甚吧？

年來對於革命理論的討論和闡明，在我見聞所及，前後三次，均堪注意：一是國民革命與全民革命的論戰，而確定了三民主義革命的性質；二是討論封建的摧毀，而認識了三民主義革命的障礙；三是胡適反黨義近著的批評，而發揚了三民主義革命的理論。前二者均由其情編輯成書：一名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已和世人見面了，又一名摧毀封建勢力討論集，在付梓中，不久便可入于讀者之眼簾。最後一者，即呱呱墮地的本書。這三書的文章，言各不同，其以三民主義做基礎，而『觸類引伸』者則一。研究主義的人們，倘取此三書進一步討論之，闡究之，不勝欣望，尤願附驥尾。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陶其情序於吳淞。

上部：
知行問題

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目錄

上部 知行問題

陶

序

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

(張振之)

一

「行易知難」的解釋

(潘公展)

二五

「知難，行亦不易」的商榷

(王健民)

五五

闢胡博士「知難行亦不易」論

(陶其情)

五九

再論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

(張振之)

七一

知難行易辨

(虛白)

九一

知難，行亦不易

(胡適)

九七

下部 政法問題

胡適所著「人權與約法」之荒謬……………	(灼華)……………	一一七
有憲法才能訓政嗎……………	(無任)……………	一三七
憲法與自由……………	(方岳)……………	一四三
人權與約法……………	(胡適)……………	一五三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	(胡適)……………	一六三
「人權與約法」的討論(汪羽軍，諸青來，胡適)……………		一七三

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

張振之

駁胡適之「知難，行亦不易」論

(一)

爲什麼要提到這個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呢？本來孫先生的知難行易說已是大家公認而堅確信仰的學說，用不着討論到這個學說的根本問題；不過因爲有人要從根本上動搖知難行易的學說，所以我們非義正詞嚴地提出這個根本問題不可了。所謂從根本上動搖知難行易說的是誰呢？就是近來言論趨於反動的胡適氏，他在北平的報紙上發表一篇「知難行亦不易」的文章，在標題之下注着「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這篇文章，不但充滿着惡意的攻擊，并且要想從根本上動搖知難行易的學說，據我的觀察，現在除了孫文主義的信徒堅確地信仰孫文學說以外，一般人對知難行易學說的態度，不外兩

種：一、是震于 總理的功業，人云亦云的信着知難行易說，而並不知道知難行易的真義；二、是迷於中國古說，或是傳歐西一家言的人，因為對於知難行易說理解不通，於是懷疑孫文學說，或者明目張膽反對孫文學說了。像胡適之氏當然屬於後者。震於 總理的功業而信孫文學說是靠不住的，懷疑孫文學說反對孫文學說的，當然是思想錯誤。所以我們尤其不得不提出這個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來鄭重討論一番。

(一)

細讀胡氏全文，「專家專家」「學術學術」的字眼不絕地寫着，無非表示胡先生是一個學者罷了。不過胡氏全文所論，無一字一句不是譏笑怒罵，從 總理的學說主義，乃至現在的黨與政府，都做了胡氏攻擊材料，可見胡氏輕於感情用事，毫無理性已達極點，已經完全喪失了學者態度的尊嚴了！有人說：「胡適之這種態度，太可恨了！」我說：「胡適之這種態度，並不是可恨，不過太可惜了！」因此，我們對於胡氏惡意的攻擊惡

意的譏笑，並不是也拿惡意對罵來報答；因為我們不願意採取了胡氏的態度來喪失我們的尊嚴。我們是要平心靜氣地尋出胡氏立論態度不當的地方，從學理上尋出胡氏理論錯誤的地方，並且要平心靜氣的闡揚孫文學說的真義，確立知難行易論的堅固不拔的基礎。現爲行文便利起見，可以分爲三部分來說：

一、評胡氏做這篇文章的動機與態度；

二、評胡氏理論的根據與其錯誤；

三、述孫文學說知難行易的真義。

這三部分的答辯，當然以第三部分最爲重要，因為我們不是盲目攻擊人家，我們要真實地做一番理論的建設，將來自然可以永絕懷疑與攻擊的言論了。但是，在目前爲對付胡氏的謬論起見，對於第一第二部分也不能不有相當的分析。

先就胡氏做這篇「知難行亦不易」的動機與態度來說。說到他的動機，這一說恐怕太遠了。誰也曉得胡適之是一個文學革命運動的先導，胡先生也常常以思想界獨一無二的人物自己驕矜；實際上，我們平心而論，中國的革命是以總理為發動。以總理為先導，總理的革命是融合東西文化的最完備徹底的革命，以政治革命為發動，由政治革命而影響到人民的生活，使文化上藝術上都發生革命運動。所以總理以革命創造了中華民國，入民國以來社會上各種枝節的革命不過是總理所領導的革命潮流的支流，而胡先生的文學革命也好像孫行者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

戴季陶先生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上說過：『……再說民國三年的時候，大家倘若肯一致贊成「文字革命」的主張，以革命黨的黨義來鼓吹起來，何至於要等到民國八年，才讓成陳獨秀胡適之來出風頭。』我想這幾句話是很可以說明文學革命的價值。如果領導了這種文學革命胡先生就要自居革命的先導，那麼劉海粟的畫的革命，張競生的所謂性學的革命，豈不是都可以自居為革命導師麼！但是胡先生好像總是不肯屈居在中

山先生之下，於是對於中山先生隨時隨地的毀謗，指望着中山先生的失敗。在陳炯明背叛總理的時候，每個黨員每個有血性的人都痛恨陳逆的毫無信義，而胡先生在當時的所謂努力上面著論，說這是南方內部紛爭，並且說陳炯明的行動也是革命的；這明明是對於孫先生表示仇敵的意思。也許胡先生是「好人政府」的倡導者，當然對於「國民政府」是幸災樂禍的。到後來，胡先生的思想好像段執政善後會議的不能善其後，越走越不通了；胡適之先生真有「何所適從」的感想。胡先生靈機一轉，就借着英國庚款基金離開中國作世界之遊，作為轉圓他的思想的餘地。他一到俄國，就寫信到現代評論大大的讚美了蘇俄在他得意洋洋繞遍了世界一週，從美國而渡到日本的時候、中國的領土三分之二已全在國民革命軍的掌握之中，同時本黨又把媚俄的共產黨清除，這又是胡先生剛出國讚美蘇俄那時所意想不到的。胡先生當又是一番「何所適從」的感想。有人問剛歸國的胡先生對於國民革命軍的感想如何，他說：「除了歌頌功德以外還有什麼話說呢？」胡先生的一種悻悻之態，躍然如見。這幾年來，國民黨國民政府大概沒有依照着胡先

生所想像的「好人」來組織，胡先生對於黨與政府自然不高興，也不免熱譏冷嘲了。如上月做的人權與約法，現在發表的「知難行亦不易」，態度都是一貫的。我真千萬不懂，是不是胡先生以前在美國學校裏所讀的超過他功課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治功課在他肚子裏澎湃起來非發洩一下不可呢？還是他好人政府的綱領已經重新組織完備要想發動好人政府運動呢？總之，這位胡先生做這篇知難行亦不易無非是因為胡先生的聰明與僥倖出風頭以後，對於總理的思想總理的革命，甚至對於總理唯一的遺產——黨與政府都加以攻擊，這是胡先生做這篇文字的動機；這個動機的由來是非常長久了。我們再觀察做這篇文字的態度，因為他的動機惡劣，所以在文章上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尤其來得惡劣。他竟敢說孫文學說有二大根本錯誤，如他在文中所說的：『……中山先生志在領導革命，故倡知難行易之說，自任知難，而勉人以行易。他不曾料到這樣分別知行的結果有兩大危險：第一，許多青年同志，便只認得行易，而不覺得知難。於是有打倒知識階級的喊聲，有輕視學問的風氣。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問知難呢？第二，一班當權